

# 路径偶然与社会结构的沙漏效应

——以东莞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小事件为例

曾平治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路径依赖理论的起点是某些历史小事件。经济学研究中往往将这些触发经济变迁的小事件视为是突变的、偶然的、随机的,偶然背后的因果关系容易被忽略。若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触发东莞发展路径依赖的历史小事件进行发生学的分析,则可以认为从个体行动者层次来看路径发生确有偶然性,但上升到社会结构的层次来看,社会结构如同沙漏,偶然性如同其中的沙粒,社会结构限定了偶然性发生的可能域,规定了路径偶然发生的时间、空间与方向。

**[关键词]** 路径依赖; 路径偶然; 社会结构; 沙漏效应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4)08-0056-08

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已被经济地理学广泛用于经济变迁的解释,许多研究证明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显著的路径依赖,那些区域内的文化、企业家网络、制度结构、技术默识等社会因素,都对路径依赖产生重大影响<sup>[1]573-601[2]62-92</sup>。这一理论的起点,是一种“路径偶然”<sup>[3]015[4]56-60</sup>,即某些偶然的歷史小事件(small historical matters),引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路径发生、定型并进入锁定。虽然路径依赖理论经历了从技术变迁至制度变迁的演化过程,但路径偶然这一基本前提仍然被经济学界所维持,路径依赖的发生充满了随机性而难以预测。

社会学看待经济事件,有着与经济学不同的视角。波兰尼指出“经济是嵌入社会关系的”<sup>[5]50</sup>,人类的经济行为不能离开社会结构孤立存在。本文将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路径偶然,试图整理出路径偶然背后复杂的社会线索,发现某些共性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路径依赖理论,增强其对区域发展进程的解释力。

##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路径依赖概念最早可追溯自生物学的物种进化研究。Waddington在《基因策略》一书中指出,物种进化也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sup>[6]</sup>。这一等级序列控制的机制一旦被某些偶然因素开启,物种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进化路径,这是路径依赖的本义。1972年,美国生物学家Eldredge与Gould发现物种进化过程中存在着间断平衡现象,进化往往是以跳跃方式而不是渐变方式进行的,偶然的随机突变因素会影响物种进化路径,此时物种进化路径的机制可能是非最优的,亦即是路径依赖的<sup>[7]82-115</sup>。

David最早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学界,他认为路径依赖的经济变迁时序是:对最终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可以由时间上较远的事件<sup>[8]332-337</sup>,包括由偶然因素而非系统性力量所引发的偶然事件所引发的,类似这样的随机过

程是非各态历经的(non-ergodicity)<sup>①</sup>。David后来再次对这一过程作了定义,一个路径依赖的随机过程是作为这一过程自身的历史渐近分布的函数<sup>[9]118-133</sup>。Arthur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将技术的选择归结为历史小事件和由于报酬递增引致的锁定<sup>[10]116-13</sup>。所谓的历史小事件指那些观察者事前无法预知的偶然事件或条件,它决定了在一组可以相互替代的方案中哪一种会被选择,并导致了结果的不可预见性。

诺思在其著名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将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发展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sup>[11]</sup>。在这一书中,诺思并未对David和Arthur看来特别关键、能够触发路径依赖的历史小事件给予过多描述,但这并不是说诺思否认这种“路径偶然”的作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诺思的后续逻辑分析,都是在Arthur的基础上推进,因此这种“路径偶然”是被诺思视之应然并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再进而将技术变迁观点拓展至制度变迁中去。诺思对偶然事件的补述是在他分析完制度矩阵之后。他认为一旦成功的路径生成,不太可能因为小事件或小错误而逆转,这是因为制度矩阵的报酬递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总体上决定了经济绩效,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发生个别变化时,可能会改变历史,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会逆转路径的方向。这一判断中有着明显的悖论,既然一个偶然事件可以引起一条路径依赖I,为何另一个偶然事件就不能够建构起新制度矩阵,而形成新的路径依赖II?诺思并没有在此做出完整的回答。

后继者不断地完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Levi提出,制度变迁的起源中,存在一个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其特征是在两个以上的选项中决定制度安排,这个时间点是关键的,因为一旦选定之后,即便未来仍存在其他选项,也越来越难以回到初始出发点<sup>[12]</sup>上;Goldstone认为早期历史事件是不能基于前期事件或初始条件而随机发生的,路径依赖呈现出一种制度

性特征,这一套制度在一段时间内的运行结果,并不是由任何特定的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只不过是从路径依赖的结果来看,其与初始条件中的随机事件有关,因此对于制度依赖不能够使用一般法则(General law)比如达尔文进化论、理性选择来进行解释<sup>[13]829-845</sup>。Goldstone还列举了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为例,Newcom发明蒸汽机并非有意要触发工业革命,相反,其初始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把水从深煤井中抽出来,这一偶然事件触发了工业革命<sup>[14]249-284[15]</sup>。Vergne&Durand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在偶发事件和自我强化条件下获得的随机过程,和在没有任何外因冲击下导致锁定的结果,这些事件对路径采纳的影响比初始条件本身要大<sup>[16]736-759</sup>。

在路径发生问题上,偶然性是路径依赖理论主导的理论路线,早期的理论中视偶然性为当然而忽略了因果解释,而后继者则演进至放弃因果解释反决定论。这种理论路线下,路径偶然本身的发生机制与因果关系,始终未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将变迁仅归因于随机与偶然,这种理论上的轻率也有学者给予了批评<sup>[17]1-7</sup>。正如后继研究所发现的,QWERTY键盘易于修理的特征,正是技术上获胜的重要原因,辛辛那提打字比赛上法院速记员的胜利也不能不说是技术的胜利<sup>[18]1-25[19]105-226</sup>。而Goldstone自身的研究恰恰证明,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前期带来的燃料需求,带来了将水从深井煤层中抽出来的技术需求,进而诱发了蒸汽机的发明。

经济学关于路径偶然的观点,既受到生物学概念借用的影响,也受到经济学的古典理论范式影响。生物进化过程中间断均衡现象,使路径依赖理论带有很深的突变论痕迹,而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也容易忽视事件前后的历史线索。因此,若深入地探讨路径偶然的发生机制,就有必要跳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具体的、变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考察路径偶然与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的某些特殊关系。

本文将借助触发东莞发展路径的两个历史

① 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不同历史事件及其发展顺序无法以100%的概率实现同一种结果。

小事件来分析这种关系。作为珠江模式的代表，东莞这种借助港澳优势发展三来一补、形成前店后厂式分工的经济形态，很早就被社会学家费孝通注意到并多次加以分析（分别是在1989年、1992年、1999年）<sup>[20]485-488[21]282-285[22]427-430</sup>。在费孝通最后一次关注东莞时，发现东莞依旧在三来一补的路径上，没有大的突破，离借船出海的初始目标相去甚远。出现这种停滞状态的原因，已有学者通过各类数据证明，那就是东莞已经陷入了对于外向型加工贸易的路径锁定（lock in）之中<sup>[23]047[24]069</sup>。

## 二、东莞发展路径中的历史小事件

对于东莞的发展路径，学界曾以“东莞模式”为名作过一些理论分析。宋昆生和戴炳源<sup>[25]015</sup>、杨英<sup>[26]19-22</sup>、王蕾<sup>[27]42-45</sup>、李玉辉<sup>[28]020</sup>、许新华和张如云<sup>[29]011</sup>、孙霄汉<sup>[30]72-76</sup>、郑建宝<sup>[31]35-36</sup>都有表述。在上述理论总结中，笔者倾向于使用李玉辉的归纳，将东莞发展路径总结为由东莞提供土地（有的是已建成的标准厂房），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外商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产品大部分出口国外。在这一基础上，笔者要更进一步补充的是，将农村土地释放盘活与“三来一补”国际资本进行要素组合，是东莞发展路径中最核心的制度安排。东莞发展路径的起点，应该从农村土地与“三来一补”相结合作为正式的开始。

通过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触发路径的起点，是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两个事件组成：

事件 I：太平手袋厂创立。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发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即“17条”）。15天后，香港信孚手袋厂的上海籍老板张子弥就来到东莞为自己的生意寻找出路。张子弥曾经去过台湾，但投资失败，差不多快要破产，才想到转到大陆来<sup>[32]</sup>。

张子弥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投资目的地，也没有可靠的渠道，他只能找到华润公司。华润公司非常热心地为他联系了广东省轻工业厅。

说起来是巧合也是天意，接待张子弥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东莞籍干部，这名干部就把张子弥介绍给东莞市二轻局。在市二轻局的陪同下，张子弥于7月30日下午到达二轻局属下的太平服装厂<sup>[33]</sup>。经过当场的试验，张子弥觉得对工人的手工和速度比较满意，于是就定下合作意向<sup>[33]</sup>。8月30日，在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的见证下，张子弥和东莞市二轻局谈定了五年期的“三来一补”合同，次月15日，获得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编号为“粤字001”的“三来一补”牌照，双方合作的太平手袋厂正式落户虎门（当时是太平镇）<sup>①</sup>。这一事件，启发和鼓舞了东莞开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1978年8月20日，东莞马上以社队企业管理局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致省、地、县外贸局的《关于发展对外加工业务的报告》，并立即组建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专司招引、服务“三来一补”之责。

事件 II：龙眼发具厂的创立。虎门公社龙眼村的张细一家是破落地主家庭出身，1952年中国土地改革中，田地全部被没收。一家五兄妹，大哥早年参加革命，是东莞外贸进出口公司的干部，而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1962年的逃港风潮中去了香港，张细则留在东莞，捱过了“文革”。

张细的一个弟弟叫张光，逃港后取得了合法身份并自学成才，办起了做假发贸易的洋行，成为逃港者当中比较有出息的商人。张光与哥哥的联系，使其较早洞察内地的动向<sup>[34]</sup>。张光的公司正面临着人工紧张的问题，听说可以在内地投资办厂，张光就有点心动，但又担心自己的身份问题，曾经两次到番禺探路，在番禺投资了两个厂，还给龙眼村捐了一辆汽车，投石问路<sup>[35]</sup>。

乡村的党政干部经历过一番意识形态的激烈争吵，31岁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力排众议，给予坚定支持，最终地方同意张光在村里设厂<sup>[36]</sup>。1979年4—5月份，外贸局派员到深圳，与张光商洽。当年7月，张光与东莞轻工业局在

① 当时的行政建制中，太平镇与虎门公社是不同的建制，太平镇是县镇，虎门公社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两者在1985年10月才合并为虎门镇。今日的虎门镇包括了原太平镇、虎门公社以及新湾镇（原新湾渔业公社）。

深圳签订了三个编号为东轻工(1979)02、03、04号的文件,在虎门、东坑、附城分别开设发具厂、漂染厂、电器厂(生产卷发用的电梳子),其中发具厂设在张氏兄弟的老家龙眼村,借村内祠堂办厂,这是东莞农村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sup>[34]</sup>。

这两个事件构成了东莞发展路径的触发器。事件 I 意味着全球化资本进入到东莞,它引致的政府反应与加工办创设,可看成是一组自我强化机制的发轫。但路径触发并未在此步完成,因为虎门手袋厂位于土地国有化的城镇,农村土地没有转变为资本参与制造业。事件 II 中,龙眼发具厂的组建意味着“三来一补”开始渗入农村,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转化为资本,创造了空间联系与制度惯例,东莞发展路径至此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事件 I 与事件 II 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事件 I 提供了事件 II 发生的可能性,从时间序列产生了前后向的联系,从而构成了一组完整的触发链条。

### 三、东莞路径发生背后的社会结构动因

这两个历史小事件的发生看似是孤立的、偶发的,然而关联当时的历史情境与东莞的社会结构变化,事件的发生能够找出一系列明确的因果线索。

历史情境提供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试行“三来一补”,发展国际贸易的政策闸门已经打开;二是香港制造业正面临转型升级,成本高企使制造业有转移寻找成本洼地的冲动。港莞两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落差,香港资本向内地倾泻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东莞社会是否有意愿、有办法承接来自香港的制造业资本,这需要东莞社会做一系列的自我调整。

而开放前夜东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东莞社会为迎接“三来一补”的落地做好了各项适应性的调整。

#### (一) 大逃港中的社会结构调整

东莞历史上便有大量乡亲下南洋,1951年关闭粤港边境之后至1981年,除开零星的、陆续的偷渡逃港,还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集中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前后,1962年前后,20世纪70年代初前后,1976—1979年间<sup>[37]64-67</sup>。1962年和1976—1979年这两次人数最多、声势最大。作为逃港重灾区的东莞,流失了大量青壮年人口,据在1990年修编的《东莞市志》的数字,1956—1981年的逃港人口数据是53732人<sup>①[38]1307</sup>。

历次逃港风潮与无线电波、侨汇物资、乡亲往来一起,使莞港两地之间的信息交流始终未曾断绝,东莞的社会意识中对于香港的倾慕是大势所趋,只是在刚性政治气氛下未有机会爆发。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旦管制有所放松,社会经济意识以大逃港的方式猛烈爆发出来,1976—1979年的逃港,几乎是一出东莞全民参与的正剧,而动因不是其他,正是社会风气发生了逆转式的变化<sup>[39]1022</sup>。被压制的“哈港意识”不再被视为崇洋媚外,而成为当地社会普遍认同的集体意识,并合法化与显在化。

大逃港还造成了两个社会结构性的后果:一是莞港乡亲网络的强化。大批新鲜血液增强了网络关系的密度与强度,既为后来乡亲返乡投资增加了社会拉力,同时,又为投资者提供了社会保护,减少了投资风险。二是地方社会资本的增加。逃出的人多是农村的青年骨干或基层精英,因为只有这些移民才有胆量、有能力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数代逃港者有不同的际遇,也承担了不同的职能。早期逃港者如张光,正好赶上香港的经济起飞,通过学习与创业获得了技能与资本;后期逃港者如张细,他们未能如前者得到技能与资本,但因为掌握了最新的信息,而成为两地乡亲网络的信使与代理人。

事件 II 中的张家兄弟,就是这一社会网络结构变动的产物。正是大逃港,造就了一大批对东莞发展至为关键的行动主体。傅高义当年

① 有当时的区公所领导向笔者承认,当时各区乡为减轻政治上的责任,多少都会有少报、瞒报情况存在。此外,也确实有些人在1978—1979年跑出去,后来又跑了回来的,所以这是一笔很难算清的糊涂账。

访问广东时,有干部向他提到,约有50%是来自于本地的香港同胞回乡投资<sup>[40]</sup>,费孝通1992年《对珠江模式的再认识》里也提到在东莞办厂的港商中,有一半是回乡的本地人。

## (二) 社队企业热: 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结构变化

很少有人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前,东莞的社队经济曾经历过一次猛烈的爆发。1975年全国兴起社队企业发展热后,东莞社队企业迎来了第一次大高潮,至1979年,东莞的社队企业达到2700多家,占农村经济比重越来越大(见表1)。

表1

1974—1979年东莞社队企业情况统计

年份	社办企业数	队办企业数	职工人数	总产值(万元)	利润(万元)	占农村三级经济比重%
1974	300	985	32136	—	—	23.5
1975	335	1112	50880	7673	—	27.1
1976	1920	—	9751	—	—	—
1977	—	—	—	11489	1465	32.33
1978	396	2222	72495	13018	1566	35
1979	435	2341	80740	15499	1956	34.8

数据来源:1974—1975年数据根据刘韦玲2009年论文《东莞社队企业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整理<sup>[41]</sup>,1976年后数据根据县社队管理局1978年9月1日《东莞县社队企业的九个问题》、1979年11月12日《东莞县社队企业情况汇报》、1980年3月20日《总结经验教训、把社队企业办活》三份档案,档案现存东莞市档案局。

东莞的社队企业后来因种种原因逐渐销声匿迹。但正是社队经济留下的许多重要遗产,为后来“三来一补”铺平了道路。

遗产之一,是壮大了集体经济的家底,尤其是造出了许多厂房、仓库等,为“三来一补”这只“候鸟”提供了“巢穴”,1978年东莞向上要政策发展“三来一补”,提出的一个优势就是东莞有大量的厂房可供吸纳外资<sup>①</sup>。这一份报告对东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对事件I有直接的诱发作用。

遗产之二,是农业人口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批农民转变为初级工业劳动力。根据茶山公社的报告,1979年1—9月,社队企业平均每人月工资约为60元,这已远远高过农业收入<sup>②</sup>。工资优势,以及工人的优越感,逐渐把大量的劳动力从农田吸出来,成为初级的、生疏的工业工人。至1978年,已有7.2万人从事社队企业工作,这相当于当时东莞劳动力人口的1/7。

遗产之三,是社队企业发展失利,造成了农村对“三来一补”落户的渴求。1980年初社队企业局报告中提到社队企业“从目前看存在问题是严重的”,当时已经有一大批企业“死火”或处于半停工状态,而已成工人的农民又不愿退回农田,从而在东莞圩镇和农村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问题<sup>③</sup>,县委书记欧阳德1979年在惠阳地区县、市委书记东莞会议上的发言,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今年我们引进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优先安排到社队去搞”<sup>④</sup>。东莞解决农村问题的这种制度安排,对路径形成与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后续影响。

社队经济深刻地改变了东莞的经济结构,强化了东莞农村社会对“三来一补”的现实需求与适应效率,为这一路径在东莞触发构成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 (三) 官员调整: 政府思维的重新地方化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对干部的“洗牌”过程。传统的军事干部或南下干部逐渐退居幕

① 县社队管理局《关于发展对外加工业务的报告》,1978年8月20日,现存东莞市档案局,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直接触发了第一笔“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在东莞的落户。

② 县社队企业管理局、茶山公社社队企业办联合调查组《用经济办法调动企业积极性》,1979年11月13日,现存于东莞市档案局。

③ 县社队企业管理局《总结经验教训、把社队企业办活》,1980年3月20日,现存于东莞市档案局。

④ 欧阳德《欧阳德同志在惠阳地区县、市委书记东莞会议上的发言》,1979年12月23日,现存惠州市档案局。

后,而一批东莞土生土长的中青年干部,于1970年的中共东莞市第三次党代会前后,进入到核心决策层中,并在1975年成为当政者<sup>①</sup>。欧阳德、李近维、郑锦滔这些随后在东莞二十余年发展历程中,起到重大影响的党政主官,开始主导发展的大舞台<sup>[42]</sup>。

这批干部与之前主政的官员大不相同,一是他们大都是在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根正苗红,历史包袱少,且有过比较丰富的农村、企业,甚至金融单位的工作经验<sup>②</sup>,在经济建设上,思想更放得开<sup>③</sup>,尤其是“60年代始就有农副产品出口香港的‘政治任务’,经济部门有一定的经验”<sup>[43]</sup>;二是他们在地方土生土长,相对于南下干部或外地官员,有利用地方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身份优势;三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地方干部,他们或多或少都有香港海外关系,这一点尤其是南下军转干部很难具备的。因为这些干部普遍身负海外关系,东莞的主政者既难以对本地的莞港网络实行强硬的政治封杀,又能够借渠道之便时刻关注香港动向。当国家制度一旦松动,东莞已经地方化的党政主官就能够甩掉意识形态的包袱,迅速抓住机会结成了傅高义所言的“党政创业者”和“企业创业者”的组合体。前述龙眼发具厂的落户正是政治结构地方化变迁的一个实际效果。

#### (四) 红色华润: 横跨社会形态的中间人

东莞历史上便有农产品对港贸易的传统,即便在“文革”期间,这一贸易传统都未中断<sup>[38]634</sup>。这种对港贸易中,有一个特殊的中间人,即华润公司。从1975年开始,华润就在深圳一带组织港商开展来料加工业务<sup>④</sup>。1978年国家计委考察团到港调研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华润向考察团介绍了自己加工装配业务的做法,希望国家推广这一贸易方式<sup>⑤</sup>,也就在当年,

国家进出口委召开会议讨论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是否可行时,责成华润起草一份文件,华润很快完成了一份文件草稿,即“17条”,上报国务院后于7月获准颁布<sup>[44]420</sup>。

华润不仅充当了一个国家制度代理人的角色,而且直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积极地推动港企到内地开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改革开放初期的华润,还经常出面“陪同”港澳商人和外商回内地投资,这种陪同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参股,一种是牵线搭桥,并成为名义上的合伙人<sup>[44]</sup>,实际上就是为外商提供政治保护。在华润的帮助下,外商逐步找到了进入内地的“门”,有报道称华润的一位高管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内地投资项目,一大半是在华润的帮助下实现的”<sup>[45]420-421</sup>。

在两地社会形态仍存在巨大差异之时,华润以红色代理人的身份充当桥梁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桥梁的存在,使港商能够降低风险成本与交易成本,香港资本敢于跨越社会鸿沟借势流入。所以,当港商张子弥在红色中间人的牵引下,来到东莞虎门,其实并不能算是异常,而应该是一种应然。同期另一个案例相映成趣:当张子弥来东莞商谈同时,顺德也在华润公司的见证下与香港商人杨钊签下了第一宗“三来一补”的合同,成立了大进制衣厂<sup>[46]</sup>。

## 四、分析与结论: 社会结构对路径偶然的沙漏效应

在东莞发展的初始状态,大逃港作为一次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生产出了有能力的行动者、调整了社会意识、并增强了莞港两地社会网络资源动员能力;盛极一时的社队企业热,为“三来一补”进入东莞农村提供了厂房与劳动

① 1975年,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为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为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

② 后来对东莞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欧阳德,从银行办事员做起;李近维,国营东莞糖厂学徒工出身。郑锦滔,农会干部出身,后来做过供销社,管过工业。

③ 有研究者还提到,广东省的经济学家卓炯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东莞的许多干部有所了解,但这一点,很难加以判断。

④ 华润官网对本公司的历史介绍, <http://www.crc.com.cn/aboutus/history/>。

⑤ 《1983—1992,先声夺人的中资窗口公司》见华润公司内部官方刊物《华润》2009年11月19日第139期, <http://his.crcmagazine.com/DMSMagaDoc/200909/06xiansheng.asp>。

力等生产资源,还有农村对生产资本的新需求;政府本地化解除了行政上的制度障碍,形成了地方政治的保护;华润作为中间人提供了跨越社会形态的桥梁,规避了社会制度风险;地方社会四个维度的组合与外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形成了历史小事件发生的社会场域,并准备好了社会行动者、行动资源、行动意愿。

这组条件中的任一单项,都仅能作为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发挥作用,然而当其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组成为一个特定的条件结构后,就成为了事件 I 与事件 II 的充要条件。换言之,只要这个条件结构存在,就一定会发生这一事件;而这一事件当且只当这个结构存在时才会发生。支撑这一论断的还有珠江模式其他地区的案例——如前述的顺德大进制衣厂、珠海的香洲毛纺厂(在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牵引下与香港永新公司合作)<sup>[47]</sup>、深圳的上屋怡高电业公司(在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中介下与香港怡高实业合作)<sup>①[48]</sup>。这些事件同出一辙,却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或是相互仿效,因此同期同类事件重复发生,就不能被解释为随机性的偶然,而应理解为不可避免、确定不移的必然趋势。

借助对东莞这一案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触发路径依赖的历史小事件,是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其偶然性背后有复杂的多元因果关系,生物进化突变论或 David 式的技术变迁理论确实不适于对其的解释。因果关系是既存的事实,因此也非如 Goldstone 所言,历史小事件不适用一般法则分析。要指出的是,在本文的案例中,路径发生在个体层次的偶然性确是客观存在——触发路径的行动者是张子弥还是梁子弥,我们无法预测;但从整体层次看,初始状态时的社会并非静止不动,在社会结构的动态演进中,有多种社会因素逐渐生成、演变、重组为一个新的条件结构,构成了历史小事件的充要条件。社会结构划定了路径偶然概率性发生的可能域<sup>②</sup>,每条偶然发生的轨道,都落在可能

域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虽然形态各异,但总体的时间、空间与方向都已被这一可能域所规定或约束。如果把社会结构想象成沙漏的外壁,那么历史小事件就像是沙漏中的沙粒,我们虽然不能够判定是哪一粒沙子漏出,但我们可以确认,它一定会在有限时间内漏出并且是从漏斗口中漏出。这就是社会结构对路径偶然的沙漏效应。

#### [参考文献]

- [1] Martin R., Sunley P. Complexity thinking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7(5).
- [2] Martin R., Sunley P. The place of path dependence i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landscape [M] //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 [3] 马良. 嵌入性理论与路径偶然: 偶然事件锁定历史路径研究 [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1(5).
- [4] 郭忠华.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偶然及其评价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3(1).
- [5]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M]. 冯钢, 刘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6] Waddington C. H., Kacser, H. *The Strategy of Gene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7.
- [7] Eldredge N., Gould S. J. Punctuated equilibria: an alternative to phyletic gradualism, Schopf T J M [J]. *Models in Paleobiology*, 1972.
- [8] David P. A.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2).
- [9] David P. A. Path dependence and varieties of learning in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practice [C]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394).
- [11]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刘守英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2] Levi M. A model, a method, and a map: Rational choic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J]. *Com-*

① 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是上屋怡高电业厂,它签约于1978年11月8日,但港方企业与当地的接触早在1977年底就已经进行。

② 所谓可能域指的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多种,但却是有限可数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集合称为可能域。

- 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1997(28).
- [13] Goldstone J. A. Initial Conditions, General Laws, Path Dependenc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 104(3).
- [14] Goldstone J. A. The Problem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J].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998(41).
- [15] Goldstone J. A. *The Happy Chance: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Global Context, 1500 - 1800*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6] Vergne J. P., Durand R.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the theory and empirics of path dependence: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estability issue,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4).
- [17] 尹贻梅, 刘志高, 刘卫东. 路径依赖理论研究进展评析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33(8).
- [18] Liebowitz S. J., Margolis S. E. The fable of the key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0, 33(1).
- [19] Liebowitz S. J., Margolis S. E. Path dependence, lock-in, and history [J]. *JL Econ. & Org.*, 1995(11).
- [20]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11卷)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21]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12卷)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22]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14卷)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23] 孟月皎. 基于路径依赖的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以广东东莞为例 [J]. *理论月刊* 2008(9).
- [24] 李红江, 罗芳. 关于对外贸易变迁路径依赖的判定——以东莞市为例 [J]. *中国集体经济*, 2013(19).
- [25] 宋昆生, 戴炳源. 论劳动力市场需求约束条件下的东莞经济模式 [J].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1994(1).
- [26] 杨英. 东莞市经济发展模式评价及新模式探索 [J]. *特区与港澳经济* 2000(1).
- [27] 王蕾. 东莞模式: 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 [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2, 24(2).
- [28] 李玉辉. 东莞模式的得与失 [J]. *科学决策*, 2006(9).
- [29] 许新华, 张如云. 东莞模式未来的选择 [J]. *特区经济* 2007(7).
- [30] 孙霄汉. 东莞模式的成就、挑战与未来 [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9, 21(1).
- [31] 郑建宝. 论东莞模式及其政策支撑体系 [J]. *经济研究导刊* 2010(26).
- [32] 陈伟华. 张子弥搞疲劳战半夜拉我们谈价 [N]. *南方都市报*, 2008, 7(16): DA40.
- [33] 陈伟华. 原太平手袋厂厂长回忆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历程 [N]. *南方都市报*, 2008, 1(21): A16.
- [34] 李平. 一间发具厂成就一个亿元村 [N]. *南方都市报*, 2008, 8(8): DA08.
- [35] 何建明, 朱子峡. *东方光芒*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 [36] 黎桂康. 我在东莞改革开放中经历的几件事 [C] // *艰辛的历程, 伟大的成就——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东莞解放60周年专辑*.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内部资料) 2008.
- [37] 申晨. “逃港风潮”与建立深圳特区 [J]. *中国档案*, 2008(10).
- [38] 东莞市地志办. *东莞市志*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5.
- [39] 杨建. 七十年代末广东开展的反偷渡斗争 [J]. *岭南学刊* 2000(6).
- [40] 傅高义. 先行一步: 改革中的广东 [M]. 凌可丰, 丁安华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 [41] 刘韦玲. 东莞社队企业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C] // *艰辛的历程, 伟大的成就——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暨东莞解放60周年专辑*.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内部资料), 2009.
- [42] 中共东莞市委组织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东莞市组织史资料(1923.10 - 1988.10)* [Z]. 1992.
- [43] 张惠玲. 东莞30年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回顾与思考 [J]. *东莞党校*, 2008(3).
- [44]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红色华润》编委会. *红色华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45] 岑坤. 联和行往事: 红色华润的前线记忆 [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1, 6(19).
- [46] 冷卫兵, 廖帆. “三来一补”企业顺德首创 [N]. *珠江商报*, 2011, 6(28): A03-A04.
- [47] 吴建登. 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建厂初工人不适应三班倒 [N]. *南方都市报·珠海读本*, 2009, 12(30): ZA18.
- [48] 周元春, 马佳驥. 一纸协议推开全国“三来一补”工业大门 [N]. *深圳特区报*, 2008, 4(10): B3.

[责任编辑 王治国 责任校对 王景周]